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三反五反运动

孙瑞鸾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三反五反运动

孙瑞鸾 编写

目 录

一、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1
二、运动的发展.....	12
三、时间.....	32
四、对象.....	42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编：苏双碧

副主编：陈君聪

编委：李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玲

马宝珠

责任编辑：郑丽敏

三反五反运动

孙瑞鸢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0,000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011—1013—1/K·148 定价：1.10元

在1951年底到1952年6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震撼着，这就是“~~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在党政军机关中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是在私营工商界中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这次运动来势猛，涉及面广，社会震动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一场大搏斗。在运动中，中共中央响亮地提出了“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口号，指明了斗争的目标是要在干部队伍中清除“三害”，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在私营工商界中扫除“五毒”，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

这次运动时间不长，但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一、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基础上发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它与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原则区别，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方

面，新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方面，新中国允许国营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其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

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这种地位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是由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形成的。

从政治方面来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常常采取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而在革命胜利以后，他们又表示愿意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为新民主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就不能把他们推开；同时，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无产阶级不能树敌过多，还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从经济方面来讲，中国经济十分落后，而在这落后的国民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很大的比重。1949年的全部工业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63.3%；1950年的全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私营商业占85%。在当时条件下，国营经济还无力取代他们，为了把落后的国民经济提高一步，为了保障城乡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国家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积极性，不仅允许他们存在，而且要允许他们有一定的发展。

可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必须保证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前途。因此，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充当领导者，在国家政权中也不能占主要地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也不能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意发展，而是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

基于上述中国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决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利用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发展城乡经济；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面，使国民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1952年以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利用、限制、改造成了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

然而，无产阶级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须采取的限制和这个政策所要达到的社会主义目的，与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是有抵触的。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会不断发生。这种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的对立。这种利益的对立是客观存在，也是三反五反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反五反运动前，为了调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全面贯彻利用、限制的政策，以求得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多方面进行工

作。

首先是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克服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城市的解放，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摆在了广大党员和干部面前。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因而思想比较混乱。有的人产生了右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过高估计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城市的工作不是要依靠工人阶级，而是要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主要不是帮助国营企业，而是要帮助私营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这种错误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这是一种糊涂思想，明确了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而在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问题上，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才是私营工业的生产。随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这种右的情绪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在当时干部的错误思想当中，“左”的情绪更为突出。主要表现是认为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有的大城市解放以后，市领导干部根本不理睬资本家，并控制贸易公司原料和市场，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有的人强令资本家开工，但对开工后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又不帮助解决。在劳资关系上，对工人的过高要求和某些过“左”行为不坚决纠正。在宣传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什么好处，

只强调要限制资本主义，而不说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进步性，不说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使得资本家恐慌消极，生产陷于半瘫痪状态，有的资本家准备停工、歇业，甚至外逃。这种“左”的情绪有一定的普遍性。1950年三、四月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争论最多的是两个问题：一、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二、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有的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是主要的斗争对象；革命已经胜利，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已经是“包袱”。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干部当中的这种“左”的情绪，严肃指出：这是一种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是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1950年4月12日、13日，周恩来两次到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讲话，全面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批评了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他说：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和公私关系。在劳资关系上既要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又要保护正当的私人资本活动；在公私关系上要以公为主，又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发展，并给予帮助。今天的方针不是搞垮资产阶级，而是要团结它。同资产阶级要有团结，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今天国营经济力量还很小，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应该予以扶助使其发展。

第一次全国统战会议期间，一份小组讨论会的发言记录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对记录中所反映出来的

“左”的错误思想作了批评。如：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排挤处，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批：“完全错误的说法。”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毛泽东批：“这是不对

的。”

鉴于干部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的情绪是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政策，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障碍，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对这种错误思想作了批评，并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总方针。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我们当前的总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推翻地主阶级，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经过中共中央的反复批评教育，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克服了“左”的情绪，为正确贯彻利用、限制政策，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大力扶植私营工商业，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连年战争，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解放初期，各地工商业普遍面临着原料供应断绝，生产资金短缺，产品销售困难，劳资纠纷不断的局面。许多工厂停工，商店歇业，生产和经营无法维持。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解放前夕，私营工厂的平均开工率不

足30%，占全市私营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的棉纺、棉织、印染等工业，历来情况比别的行业好一些，这时也70%以上的厂停工。棉纺业除欠交的纱布外，负债达600多亿元。商业也十分萧条，店主们只能让职工到马路边摆摊叫卖，几家大百货公司每天的营业收入，只能维持日常开支。解放后，一部分人对前途缺少信心，对恢复与发展生产抱消极态度。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向工商局申请停工歇业的案件，工业有1800多件，商业有7100多件，失业工人增至19万多人。

在私营工商业奄奄一息的时候，人民政府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国家有关机关和国营商业部门向许多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有的则向厂家订货或收购、包销其产品，帮助工业资本家解决产销的困难。银行也以较优惠的利率发放贷款，解决其资金方面的困难。另外，政府还加强农村农副产品的收购，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帮助私营工商业打开农村市场。同时，政府还用很大的人力、物力恢复交通运输，举办物资交流会，沟通城乡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除采取各种经济措施外，人民政府和工会还按照劳资两利的方针，出面调解劳资纠纷，既照顾了双方的利益，又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私营工商业绝处逢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以解放较早的沈阳市为例，从1948年到1951年私营工业增长近3倍。历年增长情况如下：

年份	厂家户数	职工人数
1948	6546	26008
1949	11752	47506
1950	15727	66228
1951	18421	80568

在私营工业增长的同时，私营商业也增长近3倍。历年增长情况如下：

年份	商店户数	销售总额（元）
1948	11034	/
1949	17149	762720034
1950	18143	1235007555
1951	15605	1826704504

再以北京市为例。1950年3月份，在工业的22个行业中，新申请开业的274户，歇业的95户，两相抵销，净增179户。歇业的一般是生产奢侈品或产品质量低劣，无竞争能力的厂家，而国计民生所需要的私营工厂则继续得到发展。

再次是同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作斗争。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大力扶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同时，也同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三反”“五反”以前，最突出的是在物价问题上同投机资本的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从上海发出电讯，报道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购买力下降的情况时说：法币100元，1937年可以买

二头牛，1938年只能买一头牛，1941年只能买一只猪，1943年只能买一只鸡，1945年只能买一条鱼，1946年只能买一个鸡蛋，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在解放战争后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1948年8月发行的“金元券”在几个月内就成了废纸。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投机商人，许多正当工商业者也因无法正常经营而转向投机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投机资本。这个投机资本在解放后也没有停止活动。他们利用人民政府财政经济上的暂时困难，继续兴风作浪，在市场上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1949年8月到1950年2月，我国一共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物价波动。当时，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巨大，不得不依赖发行大量货币。同时，投机资本的推波助澜也大大加剧了物价的涨势。因此，抵住投机资本的冲击，使物价只在一定幅度内波动，最后稳定下来，成了人民政府与资本家不法行为作斗争的焦点。

在上述四次物价波动中，以1949年10月中旬到11月的一次最为猛烈。从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为先导，华中、西北次之，全国币值大跌，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20%至30%的幅度猛涨，全国各大城市都受到影响，投机活动猖獗。不法资本家不仅以粮食、纱布为冲击对象，而且见什么就买什么，囤积居奇，等待高价。

为了稳定市场，使国民经济正常发展，人民政府同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了一场较量。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

员会主任陈云的主持下，全国各地一方面紧缩银根，在一个时期内减少向市场投放货币，并在抢购风大盛之时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纱布等主要物资，准备抛向市场。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中央一声令下，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高价，一齐大量抛售。这次统一行动，在几天的时间内给了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投机资本家以歼灭性的打击。市场抢购风被煞住了。从此，人民政府取得了物价问题的主动权。1950年3月以后，市场物价稳定了。以此为起点，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被消除，投机资本被击溃，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物价稳定后，因囤积居奇等投机活动而产生的市场虚假购买力迅速消失，商品滞销，市场突然疲软，由此而引起了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和工人失业的增加。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而且遍及许多中、小城市。资本家叫苦连天。1950年4月全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117万人。

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新的困难，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力调整工商业。在工业方面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由政府有关部门和国营贸易公司通过加工订货，有步骤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1950年6月至9月，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召开了粮食加工、百货产销、煤炭产销、火柴工业、橡胶工业、毛麻纺织、复制印染、卷烟工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业等全国性的专业会议。

在这些会议上，公私代表认真研究，开诚协商，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公私关系中存在着的一些主要问题，具体拟定了公私分工合作的原则及产销或业务计划，使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迅速好转，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商业方面，主要是调整批发和零售差价，改变过去差价过小的状况，使私商有利可图。

在劳资关系方面，主要是教育工人贯彻劳资两利的方针，一方面要限制资本家的剥削，改善工人的待遇；另一方面又要允许资本家获得适当的利润。

由于合理调整了工商业，加上全国大陆解放，交通恢复发展，城乡交流复苏，市场变得日益兴旺，私营工商业在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间有了长足的发展。1951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的22年中的任何一年。根据偷税漏税十分严重的税收记录计算，上海资本家1951年的帐面纯收益在60000亿元以上。资本家普遍兴高采烈。

但是，在大好的形势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中又孕育着新的危机，正是在这种危机的基础上，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

二、“三反”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

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它始终坚持自身的革命性，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性。特别是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它总是告诫党员和干部不要因胜利而骄傲，要十分警惕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腐化堕落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这个告诫曾向全党广泛传达。

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进入城市后，党员和干部当中还是有不少人经不起考验，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堕落成了贪污分子。三反五反运动以前全国共有多少人成为贪污分子，现在没有系统的资料。但从一些零散的数字中，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如：

1951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947件，其中贪污案件共531件。

北京市解放后的三年中，共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总额达人民币15亿元（旧币，下同）。

1951年1月至11月，华东各地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即达8000多件。

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所处理的贪污案件中，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高达1242亿元。

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约占36.4%，其中6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损失达80多亿元，相当于当时15000个农民的一年生活费用。

贪污分子作案都十分隐蔽，实际上各地贪污浪费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被揭露出来。另外，三反运动以前，所有贪污案件都是由有关部门个别处理的，发现一个，处理一个，没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最早发现贪污、浪费问题严重，并提出要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是中共中央东北局。

1951年9月，东北局一级各机关和东北各省、市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民主运动，揭发出党政军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如沈阳市反贪污的第一阶段，仅在工商局各专业公司就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贸易部揭发出贪污行为406件，涉及397人，贪污款额达人民币5亿元。浪费问题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因管理不善，积压物资3000多亿元，有的军事部门把物资长期露天放置，被雨淋坏，损失约